

(加) 优素福·卡什 (Yousuf Karsh) 摄



卡什肖像经典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后浪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卡什·肖像经典:普及本/陈淳焘编著. --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2.6
ISBN 978-7-5100-4887-6

I. ①卡… II. ①陈… III. ①人像摄影—摄影集—加拿大—现代 IV. ①J4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2939号

卡什：肖像经典（普及本）

摄影：（加）优素福·卡什

编者：陈淳焘

译者：毛卫东

筹划出版：银杏树下

出版统筹：吴兴元

编辑统筹：董良

责任编辑：德晓

营销推广：ONEBOOK

装帧制造：墨白空间

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版人：张跃明

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北京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 100010）

销售：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7887676）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1.5 插页 2

字数：318千

版次：2012年9月第1版

印次：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读者服务：reader@hinabook.com 139-1140-1220

投稿邮箱：onebook@hinabook.com 133-6631-2326

购书服务：buy@hinabook.com 133-6657-3072

网上订购：www.hinabook.com（后浪官网）

ISBN 978-7-5100-4887-6

定价：80.00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后浪出版公司

ALLTHINGSKARSH

卡什 肖像经典

（加）优素福·卡什（Yousuf Karsh） 摄 （加）陈淳焘（Shelton Chen） 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目 录

5	卡什自述
23	政界领导人
53	军 人
65	作 家
77	宇航员、科学家、探险家
95	艺术家、音乐家、建筑学家
119	演艺界与运动界人士
151	宗教领袖
159	工作中的卡什
167	其 他
178	陈淳焘收藏的优素福·卡什出版物名录
179	索 引
181	编者后记
183	出版后记

1924年风雪交加的除夕夜，从贝鲁特出发的班轮凡尔赛号抵达哈利法克斯，在海上航行了29天之后，船上统舱中最兴奋的旅客要算是那个16岁的亚美尼亚男孩儿了，他只会说一点点法语，英语就更不行了，那男孩儿就是我。

在那个寒冷而晴朗的冬日，那片美洲大陆上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白雪覆盖的哈利法克斯码头。我尚未开始遐想这片新土地上的无穷机遇，当时，我只意识到我是安全的了，充斥血腥屠杀、令人心碎的亚美尼亚已离我而去，这就足够了。我身无分文，受过的教育也极其有限，可我是个舅舅，我母亲的兄弟，他在等我。当我从轮船的踏板上下来的时候，他认出了曾在一张模糊不清的全家照上见过的我。这位我未曾谋面的乔治·纳卡什资助我成为移民，担保我不会沦为“公众的负担”。他从魁北克的希布鲁克市家中千里迢迢地赶来接我，而这些，还只是他许许多多了不起的善行的开端。

我们从码头坐出租车去火车站。这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马拉雪地出租车，马具上的铃儿一路不停地叮

当作响。充满欢乐的钟声在市内随处可闻，宣告着新年的来临。那商店橱窗里和房屋上令人眼花缭乱的装饰，那笑语喧哗的人流，在我眼里，无异于美梦成真，难以置信。在去舅舅家的两天旅途中，我对遥远的路程惊叹不已。火车被积雪困阻，干粮吃完了，这种情况，至少对我来说，倒并不是新鲜事。

我于1908年12月23日生于亚美尼亚的马丁，父母均是亚美尼亚人，父亲目不识丁，却有着高雅的情趣。他长途跋涉，买卖稀有的珍品——家具、毛毯和香料。母亲则是位受过教育的妇女，在当时算是罕见的了。她博览群书，更是将其最心爱的《圣经》熟记于心。在他们尚存人世的三个孩子中，我是老大。弟弟马拉克和加米尔也生于亚美尼亚，现分别在加拿大和美国。我最小的弟弟赛利姆后来在叙利亚的阿勒坡出生，只有他逃脱了我们出生地即将面临的迫害的高潮。

马丁城那一排排逐级升高的建筑据说可与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媲美，而它那硕果累累的果树园又令其居民深信它的前身就是伊甸园。具有最强烈的讽刺意味



我与母亲（我弟弟马拉克摄于 1945 年）

的是，那里竟成了土耳其人在 1915 年仇杀亚美尼亚人的场所，到处是残杀和蹂躏，尽管无时无刻不处于恐惧之中，但生活总得继续下去，无情的迫害与可怕的疾病构成了我幼年的记忆：给两个我深爱的叔叔送食物包，他们从家里被无故拖走投入监狱，接着又被扔到井里去活埋；我姐姐死于致命的伤寒，母亲的悉心照料亦无济于事。那些日子在我的回忆中交织成一种奇异的组合：鲜血和美丽、迫害与和平。

记得我曾为表妹讲述《一千零一夜》，从故事里那奇妙的船只和航行，以及那些遥远地区人物的故事中得到短暂的安慰；母亲的榜样也一直是我的慰藉，她教导我，哪怕压迫继续下去，也不要心怀仇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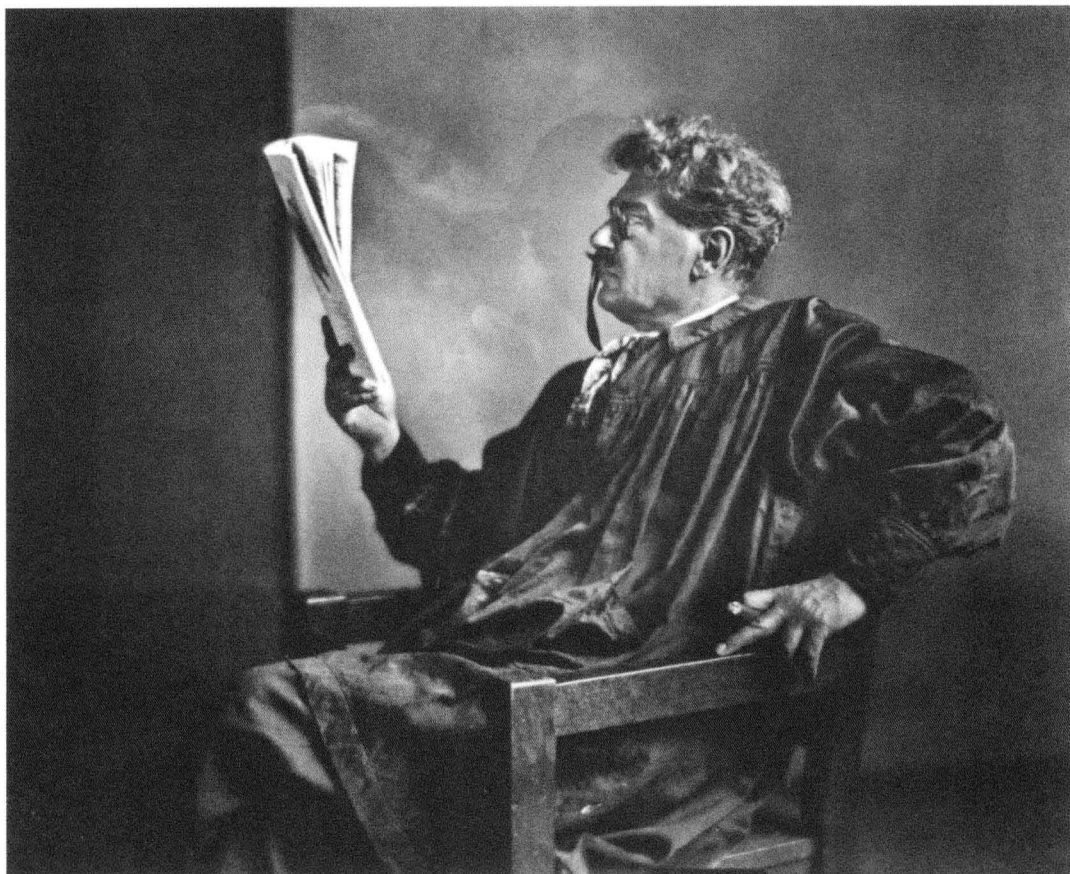
一天，我从学校回家，前额淌着血，那是被一帮土耳其男孩儿用石头砸的，他们想夺走我仅有的玩物——几粒玻璃弹。“等着瞧吧”，我怒气冲冲地对母亲说：“从今往后该我带块石块了！”母亲搂着我说：“儿子，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如果你一定要报复，可千万别打中呀！”

母亲的慷慨、力量 and 希望支撑着我们全家。她把

一个亚美尼亚小女孩带回家来，让她分享我们少得可怜的食物，鼓励她用双手代替被残暴地挖掉的眼睛。母亲自己似乎不知疲倦。她每天不得不到很远的有山泉的地方去，那是我们整个地区的唯一水源。因每次只许打一桶水，为了让孩子们有足够的水用，她可以耐心地在取水的行列中等待几个小时，对我来说，自来水至今仍是一种了不起的恩惠。

1922 年，我家获准离境。除了我们的生命，不许带任何行李，还不准我们锁门。我们只能徒步出走。由于禁止乘火车，原本两天的路程，我们搭乘的贝督因人与寇尔德人部落的大篷车却足足走了一个月。在此期间，父母耗尽了勉力积存下来的每一件值钱的东西。为了救我，父亲花去了最后一枚银币。我正傻乎乎地画着一张白骨成堆的素描时被抓获，那堆白骨便是我的国土上最后一个象征苦难的路标。

在平和安宁的叙利亚阿勒坡，父亲竭尽全力重建我们的生活。只有那些经历过终身积蓄毁于一旦的遭遇的人才能体会到我父亲赖以吸收的是一股多么强大的精神源泉。在日复一日地持续挣扎中，父亲终于设



我的导师约翰·卡罗（1931）

法送我去纳卡什舅舅那里，去那个对我这个学童来说只是地图上模糊不清的空间的大陆。

纳卡什舅舅是位卓有建树的摄影家，我去那儿时他还是个单身汉，一个慷慨成性的人。如果说我在希布鲁克中学的第一天着实给老师们出了难题的话——比如，把一个不会英语，除了良好的举止外一无所知，将来还想当医生的十六岁亚美尼亚男孩安排在几年级——那么学校对我来说却是个天堂。在那里我交上了第一批朋友，他们不仅和我一起玩耍（而不是用石块扔我了），还让我留着我赢得的玻璃弹。我所受的正规教育几乎在他开始之前就结束了，但那种被人接纳的温暖使我爱上了我的第二故乡。

1925年夏，我抑制了学医的愿望，去纳卡什舅舅的工作室干活。最初我并未意识到，与摄影艺术有关的一切俘获了我的兴趣和精力，那不仅成了我将来的谋生之道，也是我毕生情之所钟的目标。每逢周末，我就带上小相机（舅舅送给我的众多礼物中的一件），在希布鲁克周围的田野和树林漫游。我自己冲洗照片，然后请舅舅评点。我确信它们毫无可取之处，可我在

学习，而且，纳卡什舅舅是位难能可贵、不厌其烦的批评家。

我用这架相机在摄影上取得了第一次成功。我照了一张有孩子嬉戏的风景照并权作圣诞礼物送给同学。他私下拿它参加了一次摄影比赛。令我吃惊的是，这幅作品得了头奖 50 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呀！我给了朋友 10 美元，又满怀喜悦地把剩下的钱寄给我远在阿勒坡的父母。这是我能够寄给他们的第一笔钱。

此后不久，舅舅将我安排在他波士顿的朋友约翰·卡罗门下学习。这位亚美尼亚同胞被誉为美国东部出类拔萃的肖像摄影家。格乐是位明智的导师，他鼓励我上艺术夜校，学习钻研大师们尤其是伦勃朗和委拉斯凯兹的作品。尽管我从未学过绘画，连张像样的图都没画过，我还是学会了光线、设计和构图，图书馆成了我在波士顿的另一个家，在那里我成了人文学科如饥似渴的读者并开始领略到摄影艺术更加广阔的天地。

卡罗长得有些像马克·吐温，只是没有那位幽默

作家那样光彩夺目罢了，但正是卡罗本人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舅舅原本只打算让我在波士顿住六个月，但由于卡罗对我如此亲切又如此给人以激励，以至最后我与他一起度过了整整三年。在卡罗的工作室里，我学习当时摄影艺术家们运用的许多工艺，包括铂印、色素或阿拉伯树胶、碳油及含溴油的应用等。那些复杂的程序要求娴熟的技术、直觉判断、反复的训练和极端的耐心。我的第一张铂印照花了我18天功夫，它先要经过感光，然后上涂料，再经过多次感光才行。学习这些工艺令我追求完美，时间在所不惜，唯有最后的效果是至关重要的。卡罗还教会我一些比技术更重要的东西——观察并记住观察过的东西。他引导我学会独立思考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你得清楚地知道自己追寻的东西。”他说，“那么当它出现时，留住它，艺术从来不靠侥幸。”

卡罗的周围总有一种无拘无束的高雅气氛。由于在工作室里摄影用的是自然光，我们早在黄昏来临之前就停工了。每当这时候，他与艺术家朋友——都是才华横溢的男女艺术家——频繁而愉快的自发聚会就

开始了。他们来找卡罗并互相会面。在那些实行禁酒令的日子里，我的课外活动便是在这样的聚会里充当类似招待员的角色，就这样，我分享了二十年代音乐、文学、戏剧和歌剧界卓越人物妙趣横生的会晤。尽管我那时还年轻，但已经意识到：卡罗沙龙这些辉煌的下午和夜晚就是我的大学。在那里，我给那些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里程碑的男女人物摄影并潜心于这一工作。

此后，卡罗的健康情况恶化，最终于1939年去世。当时我尚在渥太华为建立自己第一个独立的工作室而奋斗，所以未能在他临终之际陪伴左右。对此我倍感痛心，追悔莫及。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我懂得并记住了这样一条普遍真理：对于那些曾经给予我们巨大帮助的人们直接地作出报答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就此无济于事地得出结论，说什么作出贡献、解脱良心上的负重为时已晚。因为我相信，要做到这一点永远不会太晚，无论这种恩情是儿子对父亲的，还是士兵对战友的，或是学生对导师的，人们很想实现这一简单的报答，而自然规律却常常不那么合作。也

许我们永远不能对某种诚挚的友情作出直接的报答，但我们必须报答——即便我们是在另一个场合和另一个时间报答另一个我们不曾谋面的人。

我于 1931 年离开波士顿。与其说我仅仅对肖像摄影感兴趣，还不如说是那些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深深地吸引了我。得益于格乐的教诲，我渴望冒险，渴望表现自我，渴望在摄影领域里不断地尝试。我把自己所有的东西装进两个提箱，迁居渥太华。在加拿大的首都，这一世界旅行的交会路口，我希望能有机会给国内一些领袖人物和众多的国际来访者摄影。我只有一个简陋的工作室，设备大都用橙色的板条箱盛放着——依我看这显得很雅致——并用僧侣穿的袈裟覆盖。偶尔，我甚至不得不从秘书那里借回她仅有的 17 美元的周薪来支付房租。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凭着年轻人的韧劲，我依然坚信自己作出了正确的抉择。

不久，我有幸见到了学识广博的 B·K·桑威尔，他是当时声誉卓著、装帧精美的期刊《周末之夜》的编辑。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热烈而高尚的关系，我的

摄影作品在他的杂志上首次被复制采纳，用以配合桑威尔政治性的和社会性的论述。

正当我的摄影工作走上轨道之时，我在渥太华的头几个月中交了几位朋友，他们邀请我去渥太华小剧场，这是一个为热情洋溢的业余演员提供表演场所的剧场。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这个随意的请求在我的职业和生活中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运用舞台灯光替台上的演员摄影的经历是激动人心的。人造灯光那无穷的可塑性令我欣喜若狂。在格乐的工作室，由于我们靠自然光摄影，往往得等上几小时才能获得理想的光线。而在这个新的场所，灯光效果的指示来自导演，他可以掌握灯光以配合他想干的任何事情，气氛可以创造、选择、改换或加强。这种再现生活的手法使我如痴如醉，一个新的世界向我敞开了怀抱。

小剧场的主要演员之一洛德·邓坎农，21 岁，英俊潇洒，是当时的总督贝斯伯勒夫妇的儿子，这对夫妻本身亦是舞台艺术的热心爱好者，在他们苏格兰的别墅里就有一个小型剧场，邓坎农竭力鼓动他的父母做我的摄影对象。于是，不久以后，披挂整齐、全副



在柳树下舞蹈的索兰奇（1938）

皇家装束的总督在他那位端庄高贵、服饰优雅的法国夫人陪同下，跨上通往我工作室的楼梯。急切和兴奋使我过分激动，而我使用英语时的错误又时时令人难堪，我甚至连焦距都没有对准。不用说，初次拍摄一败涂地。但贝斯伯勒夫妇对一个紧张得不知所措的年轻摄影师表现了极大的理解，并同意再让我拍一次。这一回，我拍摄的肖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先后在《伦敦新闻画报》、《闲谈者》杂志和加拿大各地的报纸上刊登。

有件比了解人造灯光更加重要的事情也是在小剧场发生的。在那里的第一个晚上，我就被领到一位女主演的化妆室里，她就是来自法国都尔、神采焕发、鹤立鸡群的索兰奇·高蒂尔，在我们数年的婚姻中，直到她去世的1960年，她始终是鼓励我的力量源泉。在早期的那些日子里，她就对我的才能深信不疑。她的职业是冶金方面的技术翻译。日间工作结束后，她常热衷于在各方面给我帮助。由于童年的处境艰难，我错过许多接触艺术的机会，而索兰奇在音乐、文学、戏剧和舞蹈方面都颇有造诣，她让我分享这一切。她

的去世给我带来撕心裂肺的哀伤，悲痛之余，我觉得，对她最适合的缅怀莫过于在小剧场设立一种长久的纪念形式。于是，我设立了加拿大最佳独幕剧年度奖——索兰奇·卡什奖——一笔奖金和一块依照索兰奇的照片制做的奖牌。照片是我替她拍摄的，那是在一个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她在柳树下跳舞。

但以上这些都已是后话。当贝斯伯勒总督的任期结束后，他的继任者是特威兹穆尔总督，也就是《三十九级台阶》的作者约翰·巴肯，对于探险小说读者来说，这个名字显然更加熟悉。他是个十分不拘小节的人，对总督的职位时时需要讲究的严格礼仪颇感厌烦。1936年，第一位对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来魁北克市会见特威兹穆尔总督和总理麦肯齐·金。我应邀为这位非同寻常的客人摄影。结果，这次摄影不仅是我对新闻摄影的初涉，而且也就是在这个场合，我首次遇见了麦肯齐·金总理。从那以后，在渥太华我们就不再生疏，他成了新的主顾和朋友。正是麦肯齐·金使我1941年12月在渥太华给温斯顿·邱吉尔摄影成了可能，那张



特威兹穆尔总督、麦肯齐·金总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儿子詹姆斯于魁北克。（我首次涉猎新闻摄影之作，摄于1936年）

获得世界性声誉的照片——捕获了公众心目中英国人民不屈不挠精神缩影的照片——改变了我的一生。

为丘吉尔摄影一年后，即1943年初，我搭船赴英。

在战时的伦敦，当我给一个又一个杰出的人物，如肖伯纳、坎特伯雷主教和英国皇室家族摄影时，我再次感受到在波士顿学徒期间与格乐和他的朋友们边饮酒边谈话时的兴奋。正是在伦敦，我开始养成了那个持续至今的习惯，那就是事先作好充分的准备，这意味着对即将为之摄影的每一个人物进行竭尽全力的了解。我返回渥太华时精疲力竭，但我首批“国际摄影专辑”的完成给予我一种成就感。

在这次摄影漫游中，与许多卓越人物的会见使我的生活色彩斑斓。此行的首要目的是替那些在我们时代树立辉煌里程碑的男女人士留下他们的形象。这种经历形成了我脱离自己工作室的操作方法。世界上任何一个场所——从白金汉宫到祖鲁族的土屋，从小型的日本禅宗寺庙到梵蒂冈文艺复兴时期的壮丽殿堂，哪里能架起我随身携带的相机，哪里就是我的工作室。

通过摄影活动，我不仅熟悉了我们时代一些极其

出色的人物，而且还有机会走访世上我原本闻所未闻的迷人地方。有一回我心血来潮地与一位导演朋友签了一部片子的合同，这部片子是在位于卡萨布兰卡和马拉喀什之间的摩洛哥沙漠拍摄的。那次我用上了少年时代学的阿拉伯语。我替影片中的几位主要演员拍照。摩洛哥皇室对电影公司的来临深感兴趣，邀请了十名摄制组人员参加一次非同寻常的猎鹿活动。在山脚下，他们向我们一行提供骡子、枪和贴身保镖，我们等待着主人，也就是王子的到来。当我们来到山顶上时，他出现了。他居然坐着直升飞机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从飞机上枪击他猎捕的目标！你可以想象我们当时的惊奇。

无论我去何处游览，最后总是回到我们的憩息地和避风港小温斯，那是位于里多河畔一个白桦成林、白杨成行的地方。这片略带坡度的土地是鸟类迁徙的必经之路，小温斯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此名在英语中为翅膀之意——译者注）。我们每年都拍下大量的鸟类照片，我们在那里种的树不是以它们的品种而是以我们亲爱的朋友们的名字命名的。一排枫树的侧畔伴